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晚清史学科
晚清史论丛(第三辑)



湘淮人物与 晚清社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
湘潭大学曾国藩研究中心

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晚清史学科
晚清史论丛(第三辑)

湘淮人物与晚清社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
湘潭大学曾国藩研究中心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湘淮人物与晚清社会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 湘潭大学曾国藩研究中心编.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6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晚清史学科)

ISBN 978 - 7 - 5097 - 2331 - 9

I . ①湘… II . ①中… ②湘… III . ①历史人物 - 人物研究 - 湖南省 - 清后期 ②历史人物 - 人物研究 - 安徽省 - 清后期 IV . ①K820. 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93891 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晚清史学科

湘淮人物与晚清社会

编 者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
湘潭大学曾国藩研究中心

出版人 / 谢寿光

总编辑 / 邹东涛

出版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215 责任编辑 / 宋培军

电子信箱 / renwen@ ssap. cn 责任校对 / 彭 娜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张晓莉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25. 75

版 次 /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字 数 / 442 千字

印 次 /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2331 - 9

定 价 / 88. 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CONTENTS

曾国藩和他的时代	姜 涛 / 1
曾江友谊与湘军的创立	郭汉民 暴宏博 / 12
曾国藩的天人观探析	李育民 / 30
曾国藩、左宗棠关系中的性格影响因素论析	董丛林 / 46
曾国藩批点《仪礼郑注句读》稿本述评	吴仰湘 包 凯 / 59
湘军饷源探析	罗玉明 周 扬 / 72
清御敕湘淮军平定太平天国战图考略	张铁宝 / 85
李鸿章与直隶练军	迟云飞 戴仕军 / 99
略论李鸿章幕府的两个阶段	欧阳跃峰 / 110
李鸿章平捻政策出台前后	顾建娣 / 123
薛福成与曾国藩、李鸿章	刘悦斌 / 142
丁日昌与曾国藩、李鸿章交往关系探微	邱志红 / 151
张树声督粤政绩述略	谢 放 / 167
从《开县李尚书政书》透视李宗羲的宦海生涯	袁 蓉 / 183
试论北洋集团与淮军集团的渊源关系	马平安 / 195
晚清直省“公费”与吏治整顿	关晓红 / 212
晚清“地方财政”形成疏证	刘增合 / 235
同治初年的关厘之争	
——以江南四榷关为例	任智勇 / 249
近代经济新闻价值取向及其政治语境解读	
——以《香港船头货价纸》为中心	王天根 / 258

旁观者观察清末民变的视点与反应

- 《申报》有关长沙抢米风潮的舆论取向 李细珠 / 276
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城市管理制度：以晚清北京为例 [法] 陆 康 / 292

晚清维新派、立宪派的兴起与清朝的覆灭 崔志海 / 311

戊戌时期李盛铎与康、梁关系补正

- 梁启超未刊书札释读 马忠文 / 330

绍英与《绍英日记》 刘小萌 / 344

杨度与清季制宪 彭 剑 / 353

近年中国大陆与台湾晚清秘密会社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 以一贯道为例 韩志远 / 360

天地会和兴中会 [韩] 李平秀 / 373

论罗长椅与清末民初之藏事 赵庆云 / 392

后 记 / 404

曾国藩和他的时代

姜 涛

曾国藩是晚清著名的大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理学家——旧式的正统学问家。怎样看待他的是非功过，怎样看待他的政治和文化思想遗产？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严肃课题。我于曾国藩并无专门研究，兹摭拾相关问题一二，略作探讨，因均与时代问题相关，故而命题。不当之处，尚祈教正于方家。

一 《讨粤匪檄》的是与非

《讨粤匪檄》^① 是 1854 年初曾国藩率湘军出征时发布的讨伐太平天国的檄文，表达了曾国藩和以他为代表的一班湖南士绅们的共同心声。从清王朝的角度看，这当然是一篇政治正确的宣言书。这篇檄文，现在又被一些人当作完全正面的东西进行宣扬。对此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

首先当然是看它到底说了些什么，是否符合实际。因为中国政治家们的宣言，往往是做给别人看的表面文章。其所叙内容大多靠不住，甚至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讨粤匪檄》一开始就列数并申讨了太平天国军兴五年以来的所谓罪行：“逆贼洪秀全、杨秀清称乱以来，于今五年矣。荼毒生灵数百余万，蹂躏州县五千余里。所过之境，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男子日给米一合，驱之临阵向前，驱之筑城浚濠；妇人日给米一合，驱之登陴守夜，驱之运米挑煤……”

对这些官样文字必须联系当时的历史事实进行分析，甚至完全可以从

^① 曾国藩：《讨粤匪檄》，《曾国藩全集·文集》卷三，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以下凡引本篇文字，均同此，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其字里行间获得相反的信息。

所谓“荼毒生灵数百余万，蹂躏州县五千余里”，其实正是表明了太平天国势如破竹的胜利进军：从偏于西南一隅的广西，北上进军两湖，再转而沿江东下，直至占领南京（定都为天京），累计行军5000余里，影响及至沿途的数以百万计的民众百姓。所谓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被“抢掠罄尽”，也恰恰说明太平天国初起之时极得人心，受到沿途民众的衷心拥护和全力支持。金田起义之初，太平军将士连同家属不过两三万人，在广西境内则始终未超过五万人，转战湘桂边境时甚至还遭到严重损失。而其全军人数的大发展，正是在进入湖南以后。据太平天国后期的军事领袖忠王李秀成回忆：太平军在初入湘南的道州时，所招之众，“足有二万之敷”，继而转赴郴州、茶陵一带，“亦招二三万众”。^① 曾国藩的情报官员张德坚也认为：太平军入湖南后，“由江、永而至郴、桂，更得挖煤矿徒刘代伟之党，已倍前数”。^② 至于大小船只之扫数入太平军，是在其北上进军益阳并进入洞庭湖之后。太平天国从此有了规模空前的水军。从前的船户、水手变身成为水军的将士。素孚人望的水手唐正才也一跃成为统率水军的将领。湖北巡抚常大淳曾花费经月时间在临资口沉载巨石大船堵塞水路，以为从此可以阻挡太平军向湖北的进军。但太平军水路兵马到达后，“役民夫数万人去沉船，一日而通”。^③ 这正是其时人心向背的最好说明！

至于所谓“日给米一合”云云，更是不值得一驳的谎言。太平天国实行“圣库”制度，实即军事共产主义，在占领南京之后，一度敞开供应，“发粮无数”，即使后来造册按人头供应，也远比“日给一合”为多。^④ 而初兴的太平军军纪之严明，乃至清军之腐败扰民，都是当时人所共知的事实。就连曾国藩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近日官兵在乡，不无骚扰，而去岁潮勇有奸淫掳掠之事，反谓兵勇不如贼匪之安静。”他声称要把湘军练成一支“秋毫无犯”的军队，“以挽民心而塞民口”，“以雪兵勇不如贼匪之耻”。^⑤

① 《李秀成书供原稿》第五叶下。

② 张德坚：《贼情汇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三），第296页。

③ 张曜孙：《楚寇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一），中华书局，1961，第72页。

④ 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丛刊《太平天国》（四），第656页；张德坚：《贼情汇纂》，丛刊《太平天国》（三），第277~278页。

⑤ 曾国藩：《与张石卿制军》，见《曾国藩全集·书札》卷二。

如果我们不是了解到太平天国初兴时期深得民众拥护的历史事实，如果我们不是看到曾国藩的上述信函内容，还真的要被他那表面上气壮如牛的檄文所欺骗了！

其次，我们看一篇政治宣言，还要联系到它的时代背景，看它是否较前人有新的贡献，是否不負于自己身处的时代。曾国藩所生活的时代已是世界的资本主义时代。十多年前的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得中国身不由己地被纳入了世界资本主义的体系。《讨粤匪檄》当然无法与世界先进相比。早在此前六年的1848年，两个年轻的德国人——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已写有不朽的名篇《共产党宣言》。这是为人们所熟知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文献，在这里就不去细说了。更早些时候，相当于中国的乾隆年间，先有美国的《独立宣言》（1776年），后有法国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1789年）相继问世。

1776年7月4日，北美第二次大陆会议通过《独立宣言》，在其开始部分即庄重宣布：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其赖以奠基的原则，其组织权力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可能获得他们的安全和幸福。为了慎重起见，成立多年的政府，是不应当由于轻微和短暂的原因而予以变更的。过去的一切经验也都说明，任何苦难，只要是尚能忍受，人类都宁愿容忍，而无意为了本身的权益便废除他们久已习惯了的政府。但是，当追逐同一目标的一连串滥用职权和强取豪夺发生，证明政府企图把人民置于专制统治之下时，那么人民就有权利，也有义务推翻这个政府，并为他们未来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

法国国民议会于1789年8月26日通过《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其前言部分亦提出：

组成国民议会之法国人代表认为，无视、遗忘或蔑视人权是公众

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所以决定把自然的、不可剥夺的和神圣的人权阐明于庄严的宣言之中，以便本宣言可以经常呈现在社会各个成员之前，使他们不断地想到他们的权利和义务；以便立法权的决议和行政权的决定能随时和整个政治机构的目标两相比较，从而能更加受到他们的尊重；以便公民们今后以简单而无可争辩的原则为根据的那些要求能确保宪法与全体幸福之维护。

而其第1条则规定：“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除了依据公共利益而出现的社会差别外，其他社会差别，一概不能成立。”

这两份资本主义时代的标志性文件，迄今仍不失其先进性和号召力。

如果说，与欧美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相较毕竟嫌远了些，那么我们还可以将目光转入国内，将《讨粤匪檄》与其敌方的文献进行比较。早于这篇檄文两个多月（1853年底），太平天国也有一篇重要的纲领性文件《天朝田亩制度》问世。《田制》全文3000余字，若干内容很幼稚，有许多实现不了的空想，但朝气蓬勃，充满了向上的活力。其根本指导思想是：“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①

太平天国学西方，宣扬敬拜上帝，号召反满革命，抨击“尔吞我并”、“世道乖漓，人心浇薄，所爱所憎，一出于私”的社会现实，憧憬“有无相恤，患难相救”、“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大同社会，并认为“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② 这是很可贵的朴素的平等思想。

而曾国藩发布檄文的主要目的则是激发饱受儒学熏陶的地主士绅起而保卫纲常名教和专制统治秩序的神圣不可侵犯，竭力承担起传统礼教“卫道士”的角色。《讨粤匪檄》极力回避满汉问题，但明确宣示“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并利用人们仇恨外国侵略者，重视家庭伦常的心理，指斥太平天国“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

^① 《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天国印书》，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第409页。

^② 《原道醒世训》，《太平天国印书》，第14~16页。

说太平天国将父母亦称为兄弟或姊妹，是公然的诬蔑和造谣。不过太平天国在立国之后，等级之制虽已渐趋强化，却依然保留着其初兴时的若干平等因素，如君臣都以兄弟相称即是其一。从其遗留的文献看，东王杨秀清等人在上奏天王的本章中，即称天王洪秀全为“我主二兄”，而杨秀清等则自称“小弟”，并按其地位依次为“小弟杨秀清立在陛下暨小弟韦昌辉、石达开跪在陛下”。^① 即使到了太平天国的后期，天王洪秀全对于新提拔到高层的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等乃至其他诸王仍以“胞”相称，以示亲近；而他们在上天王的本章中也依然自称“小弟”。

但造反的下等人的朴素平等思想，尤其是其学西方的举措，遭到了传统卫道士曾国藩空前激烈的讨伐。恪守纲常名教上下尊卑的《讨粤匪檄》，不仅就此与《天朝田亩制度》的朴素平等思想拉开了距离，更与《独立宣言》、《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有着霄壤之别。这样一个保卫传统纲常名教和专制统治秩序的政治宣言，其落伍于时代应是毋庸置疑的。

二 曾国藩的望死情结

曾国藩于清王朝的最大功绩是血腥镇压了太平天国的造反。书生杀人，本身似乎是个悖论。但在曾国藩的身上，书生与刽子手的双重身份却得到了和谐的统一。曾氏是恪守传统道德的正人君子，死后官谥“文正”。这一溢号至少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其政治之“正确”，一是其律己之“严正”。因为“政治正确”，所以他在对敌斗争中立场坚定，气势甚壮；因为“律己严正”，所以他屠戮太平天国和其他造反者毫不手软，勇于杀人，尽管他“正”得有点过当或做作。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近代史研究所的老所长范文澜曾给曾国藩下了一个“刽子手”的断语。他所举的素材，很多是直接来自曾国藩自己的奏折，如曾国藩“在省城设‘发审局’。凡团绅送被捕人到局，立即杀死，禁止尸亲呼冤，又禁止向团绅讲理。他竭力提倡团绅捕人，地方官杀人、捕人要多，杀人要快，官杀人‘不必拘守常例’，绅捕人‘不必一一报官’。人民更陷入朝不保夕的险境，大家叫他‘曾剃头’，形容他杀人象剃头发那样多。他感觉到公论不容，给咸丰帝上了一个奏章说：‘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又如：“曾国藩乃提倡兽性来报仇泄愤……

^① 参见张德坚《贼情汇纂》，丛刊《太平天国》（三），第203~204页。

例如兴国、大治战斗，获俘虏一百三十四名，‘一概剜目凌迟’；九江城外获俘虏十二人，立即‘凌迟枭示’；又生擒十三人，‘就地剜目凌迟’；武昌城外太平军新兵战败，‘带回七百余，全数斩决’；重阳战斗擒获七十余人，杀死祭阵亡将士，祭毕，令兵勇割人肉生吞。”又如：湘军在攻克南京时“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河尸首如麻”，“三日夜火光不息”。^①应该指出的是，即使是出自曾国藩本人的奏报，其战绩亦不免吹嘘和造假的成分。比如其所谓湘军攻克南京时，“毙贼十余万”就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据李秀成说，当时守城的太平军总共只有几千人，有一些还趁乱突围出去。攻城的湘军显然是把南京城里的老百姓也都当成所谓的“贼”加以屠戮了。曾国藩的湖南老乡谭嗣同在其所著《仁学》中就曾揭露说：“湘军以戮民为义……（城邑）一经湘军之所谓克复，借搜缉逋匪为名，无良莠皆膏之于锋刃，乘势淫虐焚掠，无所不止，卷东南数省之精髓，悉数入于湘军，或至逾三四十年，无能恢复其元气，如金陵其尤凋惨者矣。”^②

曾国藩之滥杀无辜，从其幕僚赵烈文日记所记的一件小事中亦可见一斑。1861年秋，赵烈文从上海乘英国轮船溯江而上，与其同行者有一狂妄的广东土人曾耀光，于舟泊南京附近时竟“投贼巢”而去，同时却又将名片托赵烈文转交曾国藩，说是“日后尚拟到营”。一个多月后，赵烈文在拜会曾国藩时提及此人，曾国藩告诉他：此人五六日前已到此，“以其语悖谬杀之矣”。^③曾耀光在太平天国的天京究竟有过什么样的活动我们已不得而知，但至少太平天国方面没有杀害他，更没有阻止他前往曾国藩的湘军大营。

于此可见，无论如何为曾国藩辩护，他之“刽子手”的名号应该是无法甩脱的了。

但就是这个视造反者或语言“悖谬”者生命如草芥的刽子手，其本人也有着极为强烈的望死情结。在与太平天国的生死搏斗中，他曾数度企图自杀：一是出师之初的靖港之败，二是湖口之役的坐船被夺，三是困守祁门时之预立遗嘱。而到镇压下太平天国之后，已位极人臣（武英殿大学士）且封侯爵的曾国藩终于失去了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和意趣，而此时他

^①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附录：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范文澜全集》第9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第317~338页。

^② 《仁学——谭嗣同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第80~81页。

^③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咸丰十一年七月初五日、八月二十九日。

还不到六十岁。

其身体的多病，大概是一重要的原因。早在1840年，曾国藩就已得肺病，幸而死里逃生。1845年起他又得牛皮癣，几乎伴其终身，自觉“无生人之乐”。其他还有耳鸣、肝肾等毛病，而从他最后死时的症状看，很有可能是死于中风。战争不仅耗尽了他的聪明才智，看来也耗尽了他的体能。

但疾病的折磨不应是主因，曾国藩毕竟是大政治家。他之望死，是因为他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他的历史责任感、使命感过于沉重。他看不到大清王朝的前途何在，而他自己已不可能身负起“挽狂澜于既倒”的重任；他明白自己已落后于时代，已不再属于他所生活的这个时代，但他也不愿消极地等待时代的淘汰。于是“惟望速死”就成了他自觉的诉求。

1867年7月，也就是太平天国刚被镇压之后不久、捻军尚未被扑灭之时，曾国藩与自己的幕僚赵烈文谈起了清王朝的前途命运。

赵烈文说：“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曾国藩“蹙额良久”，然后问道：“然则当南迁乎？”

赵答：“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

曾说：“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

赵则婉转地以“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作答。

赵烈文话语中所暗含的玄机，曾国藩当然不会不明白，于是便回答道：“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祏之陨。”^①

赵烈文的预测是有见地的，因为事实上清王朝在此后不到50年就被推翻了；曾国藩之望死应该也是真诚的，因为在此十多天之前他即已表示过：“自顾精力颓唐，亦非了此一局之人，惟望速死为愈。”^②而此时离他去世也确实只有5年，尽管他讲此话时才虚龄57岁。曾国藩有魄力镇压太平天国的造反，但已没有精力对付飘忽不定的捻军，更没有勇气正视清王朝即将到来的陆沉。进一步说，即使国内的问题可暂告一段落，但西洋人

①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

②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六月初八日。

已挟重器而来。清王朝虽解除了一时的内乱危机，仍摆脱不了对外交往中的失败命运。这一切再加上他身体上的原因，就使望死成了最急迫的现实问题。而再过几年，他也真的死了。

当然，“望死”并非消极的“等死”。事实上，曾国藩只要一息尚存，也仍在努力学习。死前不久，1872年初的日记中忠实地记载了他仍在孜孜不倦学习《周易》，阅读《宋元学案》等著述，而且多在三更才就寝。不过他所学的这些依然属于中国传统的旧学问。

曾国藩死于1872年3月12日（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午后，他在次子曾纪泽陪同下到署西花园散步，忽然连呼脚麻，于是被扶掖至厅堂，端坐三刻而逝，虚龄62岁。

曾国藩离世的地点两江总督署，在太平天国占领时期曾一度被改为天朝宫殿。8年前的1864年，洪秀全也正是在那里病逝。

三 “革命的遗嘱执行人”

卡·马克思于欧洲1848年革命失败后曾提出过这样一个命题：“那些镇压1848年革命的人违反自己的意志充当了这次革命的遗嘱执行人。”^①他在许多著作里，特别是在《一八五九年的爱尔福特精神》一文中阐述过同样的思想：反动派在1848年以后扮演了特殊的革命遗嘱执行人的角色，不可避免地实现了革命的要求，尽管这是在一种滑稽可笑的歪曲的方式下进行的。^②欧洲1848年革命，本质上是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各国的革命相继遭到失败，革命的果实亦被资本家阶级拿去了，但它毕竟为新的社会革命扫清了道路，为这个革命准备了基础。^③

曾国藩及其湘军集团，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太平天国革命的遗嘱执行人。太平天国和各地各族人民反清运动高涨之时，也正是天地会等会党空

① 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第429页。

② 卡·马克思：《一八五九年的爱尔福特精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第462~465页。

③ 参见前引恩格斯为1893年意大利文版所写的序言。后来有人对这一命题加以补充，提出：“如果在新的生产关系生存的物质条件尚未成熟时，革命领袖和革命政党就已经夺取了政权，那么，不论他们是多么坚定的革命者，一旦执政，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志充当了被他们镇压的反革命的遗嘱执行人。”这就使得这一命题更加完善和周延了。谭天荣：《十月革命的历史教训》，<http://www.unicornblog.cn/user1/235/index.html>。

前活跃的时期。响应太平天国的起义有不少就是这些会党所发动的，甚至湘军中亦有哥老会在秘密活动。随着太平天国等反清运动的被镇压，继承了天地会等会党传统的哥老会开始逐渐活跃起来，甚至其中有一些就是原太平军人员所为。湘军中的哥老会组织当然也可以算是太平天国革命的遗嘱执行人，这是其基层的情况。而另一方面，湘军的上层，尤其是曾氏家族，一经走上历史的舞台，也同样身不由己地成了被他们镇压下去的革命的遗嘱执行人。

洪秀全学西方，只是取来了《圣经》和学会了敬拜上帝，他所憧憬的地上天国终于还是无法建立起来。虽然有洪仁玕带来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资政新篇》，但根本没有实践的条件。

而在前引《讨粤匪檄》中对太平天国“窃外夷之绪”深恶痛绝的曾国藩，后来也不得不容忍乃至提倡向西方学习。他在这方面的贡献之一，是支持翻译出版了作为西方科学发展两个伟大基础之一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完整版^①。早在明末，西方来华的耶稣会士利玛窦就和大学士徐光启一起翻译了《几何原本》中的六卷，但还有九卷没有译出。曾国藩在镇压了太平天国之后，接受科学家李善兰的建议，拨款支持将另外的九卷翻译出来，并与已有的六卷本合成一个完整的版本。李请曾国藩作序，但曾对欧氏几何学不甚了了，只能由其子纪泽代笔。《曾序》中指出：中国算书以《九章》分目，皆因事立名，各为一法，学者往往毕生习算，“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几何原本》不言法而言理，“彻乎《九章》立法之源，而凡《九章》所未及者无不赅也”。^②《曾序》所论深中肯綮。事实上，不仅西方的精密学科，如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是典型的《几何原本》的公理演绎格式，甚至美国的《独立宣言》也具有《几何原本》的风格。前文所引《独立宣言》中关于“人人生而平等”是“不言

^① 爱因斯坦曾有言：“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6（1994年第4次印刷），第574页。1994年印刷本之与1976年印刷本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其后有关中国古代发明的两句话。1976年印刷本作：“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1994年印刷本则订正为：“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要是这些发现果然都作出了，那倒是令人惊奇的事。”爱因斯坦的原文中，并没有肯定中国做出相关发现的意思，原译文所作的增字解显然是误解了原文。

^② 曾纪泽：《〈几何原本〉序》（代家大人作），《曾纪泽遗集》，岳麓书社，1983，第133～134页。

而喻”（按其原文作“self-evident”，也即“自明”、“不证自明”之意）的论断就是典型的“欧氏公设”表述。“不言而喻”（“不证自明”）是欧几里得《几何原本》中的五个公设的基本特征。据记载，与曾国藩大体同时代的美国总统 A. 林肯（1809~1865）即认为，“人人生而平等”乃自由社会的第一公设。它很像现代宇宙学的第一公设——宇宙学原理：整个宇宙是没有中心的，处处是平权的。

曾纪泽代笔的序言得到了曾国藩的充分肯定，其批云：“文字清劲，笔亦足达难显之情。”曾国藩的儿女亲家、后为中国首任驻英公使的郭嵩焘亦有批语：“观其象而通其理，然后立法以求其数；数语尽算学之用。西洋线法推行，至于抛物线以穷其变。惟明乎数之理，故能取给于心而用无穷，以是为澈乎《九章》立法之源，故是笃论。”^① 郭批显然更深入了一层。于此可见，曾国藩对西学还是有所认识的，他的亲朋好友中亦不乏头脑清醒之人。

值得注意的是曾国藩的次子曾纪泽（长子早夭），这位侯爵承袭者丝毫没有清朝贵族的纨绔气习，而是一个中西学问兼佳的饱学之士。这与曾国藩的教育方式亦有关系。曾国藩要求自己的子女熟读深思前人关于经世致用、天文地理学问方面的书籍，为他们而后接受西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曾氏幕府人才荟萃，有西洋经验与西学背景者甚多，曾纪泽有其学习的优越条件。据曾纪泽的六妹曾纪芬说，他们兄妹曾在其父构造的船厅中观看“制造局所作径约六尺之大地球仪”。其自订年谱卷首且有观看地球仪的插图：曾国藩居中而坐，青年的纪泽和髫龄的纪芬正在指点巨大的地球仪。而这样的情景，在同治年间中国士大夫家庭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② 在曾国藩生前，曾纪泽恪遵父训，没有从政。而后虽继郭嵩焘任驻英公使，回京后也担任过侍郎之类的职务，却始终未受清廷重用，年仅虚龄 52 岁即赍志以终。也许正因为他对西学有较多了解，所以所发议论往往不为当道者所喜之故吧！

曾国藩的直系后代自曾纪泽以下很少有做官的。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新时代的先进也即旧时代的叛逆者。据曾氏第五代后人曾宪琪介绍：曾家的第三代、第四代，绝大多数留学海外，潜心做学问的多，有的更倾全

① 曾纪泽：《〈几何原本〉序》（代家大人作），《曾纪泽遗集》，第 134 页。

② 钟叔河：《从东方到西方——“走向世界丛书”叙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第 252~253 页。

力于教育事业，但做官的很少。这是很可值得注意的现象。

尤可注意的是曾氏及湘军集团的女性后代们。中国的女子除与男子一样身受政权、族权、神权三大绳索的束缚外，还受男子也即夫权的支配。但得时代风气之先的曾氏家族显然不同。仍据曾宪琪的介绍：曾家不重男轻女，曾家的女人不缠足。她的那些姑妈素质都很高，从小就被教育要自强，不能只做男人的附庸。曾家的女子终身不嫁的也不在少数。这在她们所生活的时代也是亟须勇气的，因为不嫁本身就已是一种革命的行为。

曾国藩的家乡双峰县（原为湘乡的一部分，1952年析置）近年来有着“中华女杰之乡”的美称。1995年评出的“中华百年八大女杰”中，双峰就占了一半：她们分别是全国妇联第一任主席蔡畅、中国著名的民主主义女革命家秋瑾、女权运动领袖唐群英、中共中央第一任妇女部长向警予，她们或出生于双峰或婆家在双峰。其他女杰还有培养了四位中共中央委员（蔡和森、向警予、蔡畅、李富春）的革命母亲葛健豪，全国妇联副主席曾宪植，诗人郭筠，著名教育家曾宝荪，历史学家曾宪楷，考古学家曾昭燏，东方女飞将王灿之等。双峰县还被全国妇联正式命名为全国第一个“中华女杰之乡”。^①细细推究起来，她们都与曾氏家族或湘军有些渊源。而所谓“女杰”之乡，实乃女权运动的策源地。不过这些女杰们早已走出了深山，甚至走出了国门，从而走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① 《一代女杰的背影》，娄底新闻网。

曾江交谊与湘军的创立

郭汉民 暴宏博

曾国藩、江忠源都是湘军的核心领袖，在湘军的创立过程中均起到了重要作用。曾国藩自咸丰二年底（1853年初）帮办湖南团练事务至四年正月（1854年2月）率水陆17000余人“东征”，其创立湘军之经历早已为人备述；江忠源则早在咸丰元年（1851年）即已投身军伍，后更招募楚勇屡败太平军，短短二三年间由知县位至巡抚，其经历于湘人而言自具榜样力量，且曾国藩创立水师之议实自江氏始，研究者亦多言之。^①然曾、江二人早年在京师时就有交往，后更发展为师生之谊，他们的交谊在湘军创立过程中有何作用？本文拟对这一问题略加探讨。

—

曾国藩，嘉庆十六年（1811年）生于湖南湘乡（今属双峰县），道光十三年（1833年）中秀才，次年肄业岳麓书院，乡试中举，十五年（1835年），会试不售，留京师读书，明年会试再报罢，旅费尽而还乡，十八年

① 曾国藩创立湘军之事，时人所著《湘军志》、《湘军记》及曾氏《年谱》等均有详细记载，最近20多年来“曾国藩热”兴起，相关著述甚多，然仍以龙盛运先生《湘军史稿》第二章“湘军的建立”（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第41~108页）所述最为详明。江忠源之生平事迹及其与湘军的关系，时人所著江氏行状、墓表、神道碑、传记等多有记述，今人研究成果亦复不少，如石培华《论江忠源》，南京大学历史系太平天国史研究室编《太平天国史论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第324~363页；石培华：《论江忠源的“经世”思想及其对晚清政局的影响》，《史林》1986年第1期；〔美〕孔飞力（Kuhn, P. A.）：《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谢亮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第四章第一节；杨奕青：《江忠源其人与湘军组建》，《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2年第2期；石培华：《论江忠源的政治思想及其对晚清湖南军政的影响》，《华东理工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